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人民出版社

马 克 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 兰 西 阶 级 斗 争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血 社

KARL MARX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马 克 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 兰 西 阶 级 斗 争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1949 年 5 月第 1 版 1965 年 3 月第 4 版

1973 年 7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书号 1001·2 每册 0.30 元

目 录

恩格斯的导言	3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 1848 年的六月失败.....	25
二 1849 年 6 月 13 日	50
三 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83
四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	117
注释	131
人名索引.....	147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¹

写于 1850 年 1 月—11 月 1 日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 1、2、3 和 5—6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 7 卷译出

恩格斯的导言²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³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

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 1849—1850 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 1850 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 1847 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 1848 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论文中（载于 1850 年

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① 1月号、2月号和3月号), 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 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 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 那里指出:“新的革命, 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 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 是不可避免的。”^② 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 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 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 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 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 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②)。在这本小册子里, 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 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 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 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 即: 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 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 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 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 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

① 见本书第120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703页。——编者注

间的关系。”^①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党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⁵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 *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 1789 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 1848 年 2 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 1789—1830 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 6 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

① 见本书第 58 页。——编者注

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 1849 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 *in partibus*〔在国外〕⁶ 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 1850 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

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 1848 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

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

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 1848 年还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⁷，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象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⁸。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 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

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⁹，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 1866 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 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 1848 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¹⁰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 年的轻易胜利，也和 1848 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预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 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 1871 年 5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¹¹，简直象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 1871 年为 102 000, 1874 年为 352 000, 1877 年为 493 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¹² 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 年为 550 000 票，1887 年为 763 000 票，1890 年为 1 427 000

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787 000 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¹³，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¹⁴ 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

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象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难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

1830 年 7 月和 1848 年 2 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 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 3 月 18 日夜间和 19 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①

在 1849 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掠夺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 1848 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 1848 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连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有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人在 1848 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 1848 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 1848 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 1848 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 1870 年 9 月 4 日和 10 月 31 日在巴黎¹⁵ 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①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象在老弗里茨^② 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象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¹⁶ 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③。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③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①。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¹⁷，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 1755 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¹⁸ 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 200 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① 就会延迟、拖延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¹⁹，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象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 1866 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²⁰ 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② 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

② 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

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基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①。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象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 303 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日于伦敦

载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2 卷
第 27 和 28 期以及 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
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一书，有删节；1930 年第一
次用俄文全文发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 22 卷译出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

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点。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教父〔compère〕^①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

① 双关语：『compère』——“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工业资产阶级本身愈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²¹被血腥镇压后，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拥护者，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所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支出，即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如果不改变税收制度，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

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的。国家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年或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七亿五千万法郎，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四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骗人的包工、贿赂、盗窃以及各种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盗窃国库在发行公债时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合同时则再零售式地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利用了整个国家支出和公债一样，它也利用了铁路的建筑。议会被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也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使国家出资进行的那些铁路建筑

工程。

反之，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²²。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 1847 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面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高利贷者

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多少尖刻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²³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²⁴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²⁵方面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²⁶则象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①

最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了起义。

1845 年和 1846 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1847 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判处死刑²⁷，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手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1845 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 1846 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

^① 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 1846 年 11 月 11 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 1847 年 11 月 4 日至 28 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 1848 年 1 月 12 日；在 1 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九日的炮击。（恩格斯在 1895 年版上加的注）

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 1847 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²⁸ 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²⁹ 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

想、诗意、臆想内容和辞句的总起义。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象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二十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以前，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

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这种假象引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宣布了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摆脱了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难怪乎《法兰西报》³⁰ 曾与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难怪乎拉罗什雅克兰曾在 2 月 24 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给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过几天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象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了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 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勉强设立了

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而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权力和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要知道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己解放，也就希望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

而不引起一场又会对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产生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多少变了样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由于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

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藏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难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难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³¹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³²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

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并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国家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都感到措手不及。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活动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做自己的产儿，自然欢迎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它乐意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

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最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着手解决这一任务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商品流转已有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末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本身，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³³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

德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和四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傲然自信的精神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为政府给国家债权人的这种令人称心的意外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一百法郎以上的存折储蓄银行不再付款。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公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公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而二月革命正是反对这些高利贷大王们的。

银行是在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

行破产就会象洪水泛滥一样立刻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本来应该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征收**新税**。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做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的同情的。这样做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做了牺牲呢？就是笨伯雅克³⁴，**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³⁵。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十亿巨款³⁶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

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³⁷。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受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份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旧账，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词句——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是不断反对恢复信用（以绝对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扔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而且，国民自卫军已不得不局部地、渐渐地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

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二十四营别动队，每营一千人，由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³⁸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一法郎五十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青子弟，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蛮干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十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做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³⁹。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

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描写家臣欺诈勾当的西班牙喜剧中那样的误会⁴⁰。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消耗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竟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

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或者从意大利，或者从德国，或者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欢欣，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到革命轨道上来，使它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⁴¹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喊着“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只得出来袒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协同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许多工人集会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

斯广场上武装工人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集合，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十万人荷枪待发，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得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⁴²**开会了。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跟着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走。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损害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的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蒙上反对

派的荣光。

在 5 月 4 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⁷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 5 月 4 日算起，而不是从 2 月 25 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在不断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

整个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急忙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⁴³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

了特雷拉部长所做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著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些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它在 5 月 15 日冲入了国民议会，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⁴⁴ *Il faut en finir!*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口说是调去做土工。这种土工，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实的一种好听

辞令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三千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焰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炮火。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

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学究们，他们拘守 1793 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允许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全部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 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 年 6 月 29 日《新莱茵报》）^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9—301 页。——编者注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进行这种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尝试；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共和国不得不考虑它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不可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

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配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领导的，胜利自然把政权交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盛气凌人、骄傲自大以及农民放肆的私有狂。这样，就没有任何威胁从下层来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⁴⁵。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遗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堕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⁴⁶当保镖的地步，他们不能从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甚至不敢出面，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卡芬雅克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容许这个党只能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作家、演说家和“天才

人物”为代表，以沽名钓誉者、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由于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抱着错误见解，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越降低，制宪议会就越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票数；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作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和五月十五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行为。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化身，这个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谈家，他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弄掉的革命家算账。这担保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博学的刑事调查工作引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⁴⁷：二月二十四日事件仿佛是一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中，而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被废除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很大部分的文盲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何尝不可以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急忙给旧有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有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酒店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要反对他们自己，才可以拯救**这种财产**，——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着那些给他们的期票贴现的银行家，为着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着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这首先表现于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把工人击溃之后，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债权人的掌握中了。他们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

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期票总值在二千一百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一千一百万法郎以上。巴黎有七千多家商店老板，自 2 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 2 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 2 月 24 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商人在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他的生意在 2 月 24 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 «concordats à l'amiable» 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阶级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就又变得毫不容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在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经济的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许可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 年 8 月 22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合同，而 1848 年 9 月 19 日，即在戒严最紧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文森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势必涉及比直接受害者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因六月起义而造成的耗费更加扩大了国家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是人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武士——的沙龙里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调停者协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十八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应被毁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⁴⁸的。历史的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就行了。卡芬雅克在恪守古老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峻

面具下，隐藏着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官位而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 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拟定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实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就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和6月25日的惊吓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民报》总编辑而现在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天才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爆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地界来更精确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

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派别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 «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 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做邪说来诅咒。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十足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攻击的手段。

在友好合同问题上，三色旗共和党人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个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

留作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巩固旧社会关系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拼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做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地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企图侵犯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法制的终身制宗教裁判者身上成千倍地复活起来。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宪法要求前者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者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不是**必要的人物**，——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

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资产阶级不得不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10月23日结束了。在9月2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根本性的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二百万选票，则总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徒然慎重！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里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五倍。⁴⁹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是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奸诈的天真、矫揉造作的高超的象征，是深思熟虑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谬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

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 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個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12 月 10 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造出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目光就经常注视着巴黎。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使制宪议会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而只要这个集团想在宪法中把暂时性的东西固定下来，他们就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⁵⁰。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①意义。⁵¹ 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的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据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群众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而脱离了民主主义党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

① “平庸的”德文是《einfältig》，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意为“平庸的”。“多方面的”德文是《vielfältig》，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意为“多方面的”。——编者注

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 1793 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 1793 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十二月十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慌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做经典式比拟的迷梦。

12 月 20 日，卡芬雅克宣布退职，制宪议会就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 月 19 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把自己不经审讯而判处一万五千个起义者流放的 6 月 27 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根本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 12 月 10 日，而是始于 1804 年的参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于 12 月 10 日，而是始于 2 月 24 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减少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由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唯一因为老是争不到内阁位置而未丢尽脸

的那个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做一团讨厌的废物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十八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态度和人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是基佐的面孔，——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和经常把他当做小学生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不过长着奥迪隆的奥林帕斯的前额罢了。他只是没有发觉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迈达斯的耳朵⁵²。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了。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⁵³。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身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

保皇主义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收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攻击的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六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 12 月 27 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葡萄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五亿六千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六千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你看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六百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穿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 *journées*（巨大事件），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国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一方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在纸上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则也同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一身集中了百倍分散的并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形式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不是一个跟立法权对立的行政权。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己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

勃勃的阴谋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以及它那些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已经表露出来的时候，只有当这个当选事实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 12 月 10 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 1 月 29 日，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发生冲突，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发生冲突。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 月 29 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整一个月当中酝酿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宣布辞职。但巴罗内阁为了回敬这一点却建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任，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 1 月 6 日把这个提案提交给制宪议会，提交给这早在 8 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根本性的法律以

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劾波拿巴而使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帕斯的巴罗立刻就变成了疯狂的罗兰⁵⁴，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享足，这个位置是共和党人曾经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村尼姆”即十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它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资产阶级毅力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人的敌视态度重新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不能理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借助拉托的建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书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自己的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请求议会继续存在下去。拿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请求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补充注释。这种鼓动在1月里继续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

6日和26日试过的那样用投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别动队，即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一决定要结束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决定要结束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也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力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党派。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从革命运动中结晶出来的一切，又重新溶化了；斗争重又为着各个党派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开始了。转瞬之间，各个党派重又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

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团结),并在俱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看做复活的六月起义者,是正确的。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性的问题,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二百三十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当把内阁交付审判这一点不是意味着冒失地暴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抗议软弱无力的时候却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会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制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色,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朗基党方面找寻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来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阁位置的恐惧心竟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走上**政变**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同正统王朝的权利比起来是相形见绌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那个与它正相反对的东西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十二月十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从君主国方面得来的权利。正统派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⁵⁵。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难了。“合法性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社会治安来解散制宪议会，借口拯救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五十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1月29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

巴派、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秘密活动，既密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密谋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酿、紧张、阴谋交织在一起的中心——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自己已处于戒严状态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一月危机是制宪议会的存亡问题，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是宪法的存亡问题；前一场合关系到《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场合则关系到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把他们超然世外的思想体系卖得比在地面上拥有的政府权力还要便宜。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8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要知道，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

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难道这不是起义军的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既然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地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及时提醒，从这里出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 1848 年 2 月，而是 1849 年 3 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着，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恼，但它同样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对宪法意义作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 年 5 月 8 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激愤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

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赖德律-洛兰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一成不变的控告内阁——这一次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要连同教皇把神父勾上，连同神父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说来虽然是一个选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了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保持教皇权力来保持农民对自己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那末要知道在恢复国王之前，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义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如果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如果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如果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有获得天国

财富的抵押权，就保证资产者有获得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做补充。内阁会议 12 月 23 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 月 8 日赖德律-洛兰已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 1 月里，它就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但是，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份内之事，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面的谎言，已经是国民议会份内之事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内阁已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适当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或者让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或者法国向奥地利，即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⁵⁶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⁵⁷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末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一万四千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契维塔末克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一百二十万法郎的军费，以便让地中海准备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三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不去看内阁做什么，只是听内阁说什么。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落到了不敢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应该做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谢意。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吉耶-丹维尔的角色，但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露出来的不过是自己身上那张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还以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感到高兴呢。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切齿痛恨，既已被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扔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

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那末它就只知道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六月胜利的幽灵，重温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并且这样来使自己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制宪议会是在临终时才取消了葡萄酒税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自己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

级共和党人，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做自己朋党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边怒边骂地保存了共和国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它出薪金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

于全体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做是天然保护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做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市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支持这样一种传说，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 12 月 10 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残废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经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 27 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 1849 年的二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一度陷入了麻木状态，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 10 月 19 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热的审判案⁵⁸，——在这次审判案当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

“正直的”共和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或者是只能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狄坦神；选举鼓动；对布莱阿的刺杀者的处决⁵⁹；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涉；保皇党人的卤莽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制宪议会与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这斗争每次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每次都使胜利者变为失败者，失败者变为胜利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民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的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人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他们不仅对拿破仑感到失望，而且红党答应给他们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是空幻的免除租税，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十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原是表示拥护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作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化身的一个小军士，而他还给军队的却是作为一个平凡的军士的依仗的许多大将军。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即使得不到胜利，也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投票拥护红党。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五个省内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

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到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谈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党内阁的压制，现在，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代被赶出舞台的山岳党也越来越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相反地，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的机构。于是与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对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而因为革命毅力的表现只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极端措施，所以对于这种重要立场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

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⁶⁰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5月8日的冲突重又恢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进行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不过是1848年6月的既可笑又可怜的滑稽模仿罢了。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生辰簿的；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1849年6月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⁶¹。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牢狱之患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全权在握了，——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⁶²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闹宴所留下的伤痕累累的**立法权**面孔。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的建立，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于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于**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⁶³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任何一国人民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自由。宪法第54条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⁶⁴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最初的目标，可见它同样坚决禁止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

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派一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山岳党以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 361 票对 203 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下一项议程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不顾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依旧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旧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是宪法的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依旧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 5 月 8 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 5 月 11 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实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

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这一项条文。但是，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 6 月 11 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议会里的起义**。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远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要以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当制宪议会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一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做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军队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里。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烈渴望的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 6 月 11 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

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也象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队伍又因霍乱瘟疫减少了人，因失业而有大批无产者被迫离开了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拼命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就已经成立好了，这个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⁶⁵。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巨人安泰一脱离

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⁶⁸。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⁶⁷，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山岳党下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⁶⁸ 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存下来的代表，虽然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然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绝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他们的原则、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熬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 6 月 13 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⁶⁹。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派“处在宪法之外”(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非是等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 6 月 13 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道行进的列队游行；三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道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些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遇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内心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

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象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游行行列在和平路和林荫道的拐角上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 6 月 11 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时，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团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工艺学校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开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小心的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团本身还阻挠人民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做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 1848 年的 6 月 23 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 1849 年的 6 月 13 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不由普遍运动决定；所以，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的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在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课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刀剑，而是一根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在甚至连对抗的影子都不再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团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非法逮

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之后，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奖励。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概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官吏重受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充满着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捂住了报刊的嘴，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只是为使词句生动而造作的腔调和姿势。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对共和国表示贵族式的轻蔑侮辱，讨好卖俏地、轻浮地吐露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的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看到复辟已经在法国大门外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

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奇的，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倒是让人民取胜的保皇党人所表现的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不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而发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最微小的共和礼尚——例如以“公民”一语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

入罗马⁷⁰，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六月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在8月中，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已为好几个月以来的保皇主义闹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公然恶作剧地留下了一个由二十五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派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比他们所意料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原来被历史判定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覆，却又被历史注定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解除，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的文坛代表《世纪报》⁷¹，转向**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机关报《新闻报》⁷²，转向**民主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社会主义**。

随着公开的**俱乐部**渐渐变得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也就愈加推广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脑袋去掉，然而留下的群众却长出了他们自己的脑袋。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所干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行为，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恐怖还成问题的红

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①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⁷³，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必须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修女们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⁷⁴。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令人厌烦的开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②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往爱姆斯去参拜而起了疑心，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⁷⁵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要想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

① 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编者注

②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奥尔良派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关于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付三十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七百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 «pauvre honteux» —— 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两者择一：**要么做凯撒，要么进监狱！**^①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付九百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更加剧了波拿巴同内阁和国民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出乎真意”⁷⁶，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最贱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被了解的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⁷⁷ 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

^① 这是套用并改写了尤利乌斯·凯撒的一句话：“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编者注

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是真正相信总统的吗？“够了！够了！”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①，前威斯特伐里亚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确切些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立即迫使他收回了这个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使这两者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份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云雾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

① 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

咨文中用颇为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经不只是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得人心，那末秩序党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 1849 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 1850 年 3 月 10 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保卫着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方的篡夺欲望和谋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它们各自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观念性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

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充实其余一切复辟，而且与它们一起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无个人利害关系的观念性的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被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藏在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在前台出现了。它把君主国所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排斥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或使它们受支配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是金融贵族旧目的同盟者和

共谋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闹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同国家债务、交易所投机生意、金融有利害关系。难道所有这些第二流的交易所投机家不会把那个在巨大的规模上、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必须愈益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

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兑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⁷⁸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赋税制度！保留葡萄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得税！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位老大臣。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①的最知心的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赋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国家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依靠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赤字。他答应过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六

① 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对于帕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三年徒刑。（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千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贵族有资产阶级其余的互相竞争的集团在一旁，当然就不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那样无耻贪婪。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铁路的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的话题的国家证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富尔德和波拿巴在 3 月 10 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 2 月 24 日那样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 1850 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 1849 年 12 月 20 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做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郎贝尔。他的论据非常简单。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永远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郎贝尔所谓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间又把它形式稍加改变，重新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无权的下等阶层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十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走这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又看见它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恨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恨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

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项税使人口在四千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这样的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额。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 *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农民无法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一千二百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做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品尝政府的香味，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这表明路易·波拿巴是和别人一样的。但他又和别人不一样，他曾是**农民发明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形式偿付过的贡赋。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的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

地是由他自己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周围积聚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零碎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贫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押据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

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到处接壤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 1840 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 5 237 178 000 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 355 200 万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 1 685 178 000 法郎，其中扣去 55 000 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 亿法郎付给法官，35 000 万法郎用于赋税，10 700 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即 53 800 万法郎；每一口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 25 法郎。⁷⁹ 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至今还借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

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册子、论丛、日历以及各种各样的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夸大和无耻地歪曲了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³⁷ 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五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态，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① 的前任议长；表现于 1849 年 12 月 20 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³⁸，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 1794 年和 1795 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 1815 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 年 1 月和 2 月间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在对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对市长的关系上成为宗教裁判者，并且到处实行谍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思想家、辩护人、教育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象追逐野兽一样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市长法案**，在市长们头

^① 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 1815 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恩格斯在 1895 年版上加的注）

顶上悬挂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⁸¹，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十七个军区改变成为四个帕沙辖区⁸²，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葡萄酒税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十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完全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茅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⁸³后，立刻又在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咨文⁸⁴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青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们不应该

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省长的王朝残废人物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⁸⁵，这家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一切不信任投票，坚决不肯辞退自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批发式地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零售式地笼络人心。**梯也尔脱口而出，说些关于“政变”和“冒险举动”的威胁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借口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派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派又一次夺走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

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象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妻子受到自己的贵族丈夫鄙视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⁸⁶的要求在法国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⁸⁷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对**秩序**

党的一般垄断的攻击！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这在某些人那里是故意的欺骗，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是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是《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比较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商业摆脱旧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参加秩序党的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符合而被他们摒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是以债权人的身分来迫害这个阶级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那末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

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信徒，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的时候，——延搁已久的为填补 6 月 13 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的补充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

办法可以摆脱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了借口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一定要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⁸⁸，来挑拨人民。徒劳无益！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末政府自己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拨吓退了。国民议会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⁸⁹上取走不谢花花圈，也没有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得到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人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无益。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上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枉费心机；他挑拨左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得到的只是议长命令他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沉默的幸灾乐祸的神情许可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所得到的只是人民在2月24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拨行为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止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曾于6月被放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⁹⁰一书，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勃朗

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教徒的教育法的活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代表，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是象在 2 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站在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拼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大吃一惊。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 年 3 月 10 日的选举！这是 1848 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 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 1830 年落选。最后，1850 年 3 月 10 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 5 月 13 日选举的翻案。3 月 10 日的选举是对 5 月 13 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 月 10 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⁹¹。

“3 月 10 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

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 1850 年 3 月 10 日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又是他们的中立人物了。如果他们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罢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做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十二万七千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⁹²！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 年 6 月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 年 6 月 13 日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陪臣——小所有制——已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本身不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的铁环。**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 1848 年 2 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⁹³ 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① 那样潜入的，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 1848 年 5 月 4 日，1848 年 12 月 20 日，1849 年 5 月 13 日，1849 年 7 月 8 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 1850 年 3 月 10 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看做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种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每次又从本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全部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使一切现存权力成为问题，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 1850 年 3

① 双关语：“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 1895 年版上加的注）

月 10 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做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的第二号科布伦茨⁹⁴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激起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它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抛弃立宪共和国，向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自己给自己做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 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①

^① 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四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文中首先叙述了 1847 年在英国爆发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 1848 年 2 月和 3 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 1848 年即已开始而在 1849 年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的胜利成为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做了如下的论述：）^①

从 1849 年，特别是 1850 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牟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使法国出现了许多投机企业，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企业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 年的前九个月为 6 300 万法郎，1849 年的前九个月为 9 500 万法郎，1850 年的前九个月为 9 300 万法郎。而 1850 年 9 月份，进口税比 1849 年同月又增加了 100 余万法郎。出口在 1849

① 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 1895 年版写的。——编者注

年也有所增加，而 1850 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 1850 年 8 月 6 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 年 3 月 15 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 37 300 万法郎（1 492 万英镑）。1849 年 11 月 2 日，银行券流通额是 48 200 万法郎，或 1 928 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 436 万英镑，而 1850 年 9 月 2 日是 49 600 万法郎，或 1 984 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 500 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 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 1 400 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 12 300 万法郎，或 500 万英镑，这一事实很好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①中的论断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搞垮，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 年 6 月 10 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 200 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 500 法郎。1848 年 3 月 15 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免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 35 000 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 100 法郎的银行券。4 月 27 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 1848 年 5 月 2 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 44 200 万法郎。1849 年 12 月 22 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 52 500 万法郎。最后，1850 年 8 月 6 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

① 见本书第 97—101 页。——编者注

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⁹⁵。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⁹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临时政府在巴黎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二千五百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

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使对方丧失威信，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那么**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迫使在4月28日举行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懈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是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消除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即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的意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大起

来的秩序党，反对这个心地善良的候选人，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⁹⁷，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做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十七个城官⁹⁸。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严的宁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

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十五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拖延，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庄严的宁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不祥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做补充，即新的出版法。后者不久就

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的连载小说附加特别的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达到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期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⁴⁷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⁹⁹、《立宪主义者报》¹⁰⁰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竟只

是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方面。¹⁰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三期第 16 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保卫着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方的篡夺欲望和谋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它们各自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①

不得已的共和派^②这出喜剧，即反对现状的喜剧以及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的经常重新团结；每一个集团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刀剑相见，而

① 见本书第 96—97 页。——编者注

② 暗喻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

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接吻¹⁰²，——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象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依靠不就在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三百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严的姿态，提到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做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三百万法郎的要求，而只决定拨给波拿巴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做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二百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许给波拿巴的，而是许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在讨论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第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¹⁰³ 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的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的罚金五千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粗暴无礼的文章

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集团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 8 月 11 日延期到 11 月 11 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自己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二十八人组成的在议会休会期间保护共和国美德的常设委员会¹⁰⁴。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而且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王室的融合。报纸上登满了在圣莱昂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死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莱昂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他们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国外的]内阁¹⁰⁵，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美

德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¹⁰⁶ 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给予比较明确的规定；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权限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 1852 年 5 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掌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宪制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现状成为问题，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 1852 年 5 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

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也理解错了。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莱昂纳兹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马车大批装载着十二月十日会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演说，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演说，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象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①，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为一方跟尚加尔涅为另一方的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他成了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的新亚历山大¹⁰⁷。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越来越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具有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自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年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嗾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

① 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

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的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水杯中的风暴。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的原则维护者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的一切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穷于应付；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完全用尽，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注 释

- 1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篇连载文章，总题目叫《从1848到1849年》，是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这本著作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做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本著作最初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三篇：《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中都得到了阐述。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柏林出版，书中并载有恩格斯写的导言。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国际述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书中前三章的标题均依照杂志的原样不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第1页。
- 2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在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而写的。

从费舍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篇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被否决）。

恩格斯在1895年3月8日给费舍的复信中，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

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从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25 日给考茨基的信和 3 月 28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使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书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1895 年 3 月 30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愤慨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 1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 3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谈到《前进报》在发表导言时的这种不光彩做法时说：李卜克内西“从我给马克思关于 1848—1850 年的法国的几篇论文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在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27 和 28 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仍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在恩格斯逝世后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分子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载于1895年《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ѣло»)杂志第1册上。——第3页。

- 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3页。

- 4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

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 5 页。

5 指 1871 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 6 页。

6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第 7 页。

7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 是于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 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 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 1830 年七月革命到 1848 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 10、45 页。

8 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代，法国参加了克里木战争(1854—1855)，为意大利问题发动了对奥战争(1859)，和英国一起参加了对华侵略战争(1856—1858 和 1860)，开始侵占印度支那，策划了对叙利亚(1860—1861)和墨西哥的远征(1862—1867)，最后，1870—1871 年间对普鲁士进行了战争。——第 10 页。

9 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国当权派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自己是“民族的卫护者”，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第八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526—587 页)和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0—183 页)。——第 11 页。

10 国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1864 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

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第11页。

- 11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缴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12页。
- 12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第12页。
- 13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13页。
- 14 恩格斯引自马克思所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第14页。
- 15 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以及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的帮助之下，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另见《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法兰西内战》

1970 年中文版第 5 页)。——第 18 页。

- 16 1809 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的法国军队在 1809 年 7 月 5—6 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 1815 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 18 页。

- 17 比利时在 1890—1893 年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 1893 年 4 月 18 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 月 29 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这一法律规定对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的男子实施普选权。此外,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 19 页。

- 18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个斗争以 1755 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了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了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 20 页。

- 19 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的意图。——第 21 页。

- 20 暗指 1866 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 1866 年归并于普鲁士。——第 21 页。

- 21 1832 年 6 月 5—6 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1834 年 4 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

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它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第26页。

- 22 罗伯尔·马凯尔 是法国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奥诺莱·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28页。
- 23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1846年11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9页。
- 24 宗得崩德 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第29页。
- 25 圣同盟 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29页。
- 26 巴勒摩 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8年1月12日，该城人民举行起义。经过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该城。巴勒摩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摩起义也被镇压。——第29页。
- 27 1847年春，在安德尔省的比桑歇，由居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头，

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桑歇事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847年4月16日把四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第29页。

- 28 《国民报》(《*Le Nationa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第30页。
- 29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30页。
- 30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是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的机关报。——第32页。
- 31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缘。——第35页。
- 32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必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35页。
- 33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这里指卢森堡委员会。——第37页。
- 34 笨伯雅克是法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第39页。
- 35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6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第39页。
- 36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贵族在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的。——第 39 页。

- 37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在伊甸园中有一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因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而禁止人们摘食。——第 40、106 页。
- 38 拉察罗尼 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第 41 页。
- 39 根据 1834 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强迫贫民同意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

巴士底狱 是十四至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十六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第 41 页。

- 40 在十六世纪，特别是十七世纪，西班牙的喜剧中常常是主人假装成仆人，仆人假装成主人，结果闹出了又混乱又可笑的纠纷。——第 42 页。
- 41 指 3 月 18 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 4 月 9 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 43 页。
- 42 从本页到第 77 页，国民议会是指 1848 年 5 月 4 日至 1849 年 5 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第 44 页。
- 43 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45 页。
- 44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人民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企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 5 月 15 日的人民发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发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部。——第 46 页。
- 45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

1847 年 10 月至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51 页。

- 46 《国民报》派 又称 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见注 28)是它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对巴黎无产阶级的镇压。——第 51 页。
- 47 指 1848 年 8 月 28 日《辩论日报》的社论。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的简称，1789 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 53、123 页。

- 48 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 56 页。
- 49 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承继了犹太的王位。——第 60 页。
- 50 百合花 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 是波拿巴派的标志。——第 61 页。
- 51 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 1848 年 12 月 21 日《新莱茵报》第 174 号上的 12 月 18 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的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第 62 页。
- 52 迈达斯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太阳神阿波罗把迈达斯的耳朵变成一对驴耳。——第 64 页。
- 53 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在 1849 年 8 月 26 日自封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这里指拿破仑第三。
- 杜山-路维杜尔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海地岛上领导黑人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统治的革命运动领袖。——第 64 页。
- 54 疯狂的罗兰 是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第 68 页。
- 55 指英国将军乔·蒙克，1660 年他曾利用他手下的政府军队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第 71 页。
- 56 公安委员会 是 1793 年 4 月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委员会在与国内

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 1795 年 10 月被解散。——第 75 页。

- 57 国民公会 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构。从 1792 年 9 月存在到 1795 年 10 月。国民公会在吉伦特派执政期间，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消灭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在热月党统治期间，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第 75 页。
- 58 1849 年 3 月 7 日—4 月 3 日在布尔热对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见注 44）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布朗基被处以十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 79 页。
- 59 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处死刑。——第 80 页。
- 60 奥菲士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寻求金羊毛的远航。——第 82 页。
- 61 涅墨西斯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德。——第 82 页。
- 62 雅努斯 是古罗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第 83 页。
- 63 第 V 条属于 1848 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的。——第 83 页。
- 64 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 1849 年 5 月 28 日至 1851 年 12 月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第 83 页。
- 65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 1849 年 6 月 12 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 1843—1851 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主编）。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 86 页。
- 66 安泰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第 87 页。
- 67 参孙 是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 87 页。

- 68 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人民报》第206号上发表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第87页。
- 69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第87页。
- 70 马克思指的是由三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第92页。
- 71 《世纪报》(《*Le Siècl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第92页。
- 72 《新闻报》(《*La Presse*》)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第92页。
- 73 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亨利五世)，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系中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斯。——第93页。
- 74 波提乏和约瑟是圣经中的人物，详见《创世记》第39章。——第93页。
- 75 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力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特。——第93页。
- 76 “出乎真意”(《*motu 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第94页。
- 77 引自德国诗人格·海尔维格《来自山上》，见格·海尔维格《活人的诗》。——第94页。
- 78 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第100页。
- 79 总数不符，应该是578 178 000法郎，而不是538 000 000法郎，显然数字印错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都不到25法郎。——第105页。
- 80 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死亡，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在三万六千票中得了二万票，以多数票当选。——第106页。

- 81 达摩克利斯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宠信。据传说,达摩克利斯应迪奥尼修斯之约赴宴,席间迪奥尼修斯想使羡慕他的达摩克利斯相信人的安乐是不长久的,就把达摩克利斯安置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系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达摩克利斯剑”一词是经常的、迫近的和可怕的危险的同义语。——第 107 页。
- 82 1850 年 3 月 10 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四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第 107 页。
- 83 指 1849 年 10 月 31 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第 107 页。
- 84 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 1849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发表在 1849 年 11 月 11 日《通报》上。——第 107 页。
- 85 《拿破仑》(《Le Napoléon》)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波拿巴的机关报;1850 年 1 月 6 日至 5 月 19 日在巴黎出版。——第 108 页。
- 86 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派别。在曼彻斯特领导自由贸易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109 页。
- 8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 伏尔泰主义 特指十八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第 109 页。
- 88 自由之树 是 1848 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并由国民公会做了明文规定。——第 112 页。
- 89 七月纪念柱 是 1840 年为纪念 1789 年 7 月 14 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黎建立的;自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圈。——第 112 页。
- 90 F.Vidal.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Paris, 1846. ——第 112 页。
- 91 马克思在这里暗示“武装起义”。当时巴黎的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

构筑街垒。——第 113 页。

- 92 巴托罗缪之夜 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规模地惨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发生于 1572 年 8 月 24 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第 114 页。
- 93 据希腊神话，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第 115 页。
- 94 科布伦茨 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 116 页。
- 95 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 1849 年 11 月—1850 年 2 月的《人民之声》报上，于 1850 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第 119 页。
- 96 1797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比价，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到 1819 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第 119 页。
- 97 指巴黎商人亚历山大·勒克莱尔，他由于以国民自卫军的身分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第 121 页。
- 98 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 121 页。
- 99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 年至 1857 年在巴黎出版。1848 年至 1851 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融合的观点。——第 123 页。
- 100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123 页。

- 101 指两个文件：一个是发表在 1850 年 8 月 11 日《1850 年人民》报第 6 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个是发表在 1850 年 8 月 14 日该报第 7 号上的《告人民书》。——第 124 页。
- 102 拉摩勒特式的接吻 (*Baiser Lamourette*)，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 年 7 月 7 日立法议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第 125 页。
- 103 《权力报》(《*Le Pouvoir*》)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 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第 125 页。
- 104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 32 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二十五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 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三十九人组成：常务局十一人，庶务三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二十五人。——第 126 页。
- 105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
- 这里是指预定在正统派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取得政权时所要成立的由德·列维斯、圣蒲利斯特、贝利耶、帕斯托里和德斯卡尔等组成的内阁。——第 126 页。
- 106 指所谓的《维斯巴登宣言》，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特尔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 1850 年 8 月 30 日在维斯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这个声明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论战。——第 127 页。
- 107 戈尔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用乱结把轭系在马车的辕上，牢固不可解，声称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第 129 页。

人名索引

A

阿尔伯(Albert 1815—1895)(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30、33、45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é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82页。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梅克伦堡-施维林公主(Orléans, Hélène, Prinzessin von Mecklenburg-Schwerin, duchesse d'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媳妇，法国王位僭望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94页。

奥普尔，阿尔丰斯·昂利(Hautpoul, Alphonse-Henri 1789—1865)——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陆军部长(1849—1850)。——第96、106、112、122、129、130页。

奥赛，沙尔(Haussez, Charles 1778—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极端的反革命分子，1829年任海军大臣。——第113页。

B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被赦后流亡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70、114页。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q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法国的波罗的海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第91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21、30、53、63—65、67—71、75、84、85、91、94、96页。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

- 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物；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114页。
- 巴涅尔，洛朗·安都昂 (Pagnierre, Laurent-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第73页。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26页。
- 巴斯蒂德，茹尔 (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第56页。
- 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 (Boguslawski, Albert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第20、22页。
- 柏拉图 (Platon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第58页。
- 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 (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者。——第95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施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13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74、94页。
- 俾斯麦，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7、11、13、21、22页。
-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写有许多军事著作；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奥尔良党人；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立法议会议员。——第64页。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日

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其长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在普法战争初期进行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95页。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元帅。——第95页。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第30、33、36、42、44、45、53、66、80、112页。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70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评论》和其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第102页。

布莱阿，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éa, Jean-Baptiste-Fidèle 1790—1848）——法国将军，反动分子，曾参与镇压1848年的六月起义，为起义者枪决。——第80页。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99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第11、44、70、111、112、114页。

C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75页。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113页。

D

戴克里先（Diocletianus 245左右—313）——罗马皇帝（284—305）。——第23页。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 Jean-Baptiste 1780—1852）——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100页。

德弗洛特，保尔（De Flotte, Paul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1848年5月15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

积极参加者，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12、114页。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年）被驱逐出雅典。——第95页。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22页。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首脑。——第30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内务部长（1848和1849）；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第59、62、100页。

杜克累尔，欧仁（Duclerc, Eugène 1812—1888）——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国民报》编辑（1840—1846），1848年5—6月任财政部长。——第73页。

杜山-路维杜尔，弗朗斯瓦·多米尼克（Toussaint-Louverture, François-Dominique 1743—1803）——海地黑人革命运动的领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治。——第64页。

F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第64、74、85、96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18页。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30页。

福适，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26、64、70、72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93页。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宫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

40, 55, 68, 97, 100, 101 页。

富吉耶-丹维尔, 安都昂·刚丹(Fouquier-Tinville, Antoine-Quentin 1746—1795)——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1793 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第 76 页。

富歇, 约瑟夫 (Fouché, Joseph 1759—1820)——十八世纪末和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革命时期是雅各宾党人, 拿破仑第一的警务大臣; 以毫无原则著称。——第 107 页。

G

格拉古(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 123—122),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弟。——第 21 页。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 133),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 21 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 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 无原则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持极右翼立场,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 123 页。

格朗丹, 维克多(Grandin, Victor 1797—1849)——法国厂主, 众议院议员(1839—1848);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 26 页。

古德肖, 米歇尔 (Goudchaux, 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 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 五十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 53 页。

H

海瑙, 尤利乌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奥地利元帅, 曾残酷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 由于残暴, 得绰号“疯狂的鬣狗”。——第 93 页。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J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26, 29, 30, 48, 56, 64, 71, 91, 96 页。

吉纳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Guinard, August-Joseph 1799—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制宪会议议员, 曾积极参加 1849 年 6 月 13 日山岳党的发动。——第 114 页。

居比耶尔, 阿梅德·路易 (Cubières, Amédée-Louis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39 年和 1840 年任陆军大臣, 1847 年因营私舞弊被降职。——第 100 页。

君士坦丁 (Konstantin 274 左右—337)——罗马皇帝(306—337)。——第 23 页。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44页。

卡尔利埃，比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107、108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47、48、51、52、55—57、59—63、67、68、73—75、81、87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第113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制宪议会议员；秩序党的坚决反对者。——第112—114页。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

(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2—1872)——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第123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相传他监察极为严格。——第56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著作家；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94页。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96页。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大会，如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议会议员。——第99页。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国。——第36、53、80页。

克莱米约，阿道夫(Crémioux, 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1848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第 30、73 页。

克勒尔，恩斯特·马提阿斯 (Köller, Ernst Matthias 1841—1928) —— 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属保守党，国会议员 (1881—1888)，1894—1895 年为普鲁士内务大臣，奉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第 23 页。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 (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 —— 法国律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 第 101 页。

L

拉菲特，雅克 (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 —— 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府首脑 (1830—1831)。—— 第 25、26 页。

拉克罗斯，倍尔特兰·特奥巴特·约瑟夫 (Lacrosse, Bertrand-Théobald-Joseph 1796—1865) —— 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期是公共工程部长；1850 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 86 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Auguste-Georges 1805—1867) —— 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国的参议员。—— 第 32 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 —— 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 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 第 30、31、36、44、47 页。

拉摩勒特，阿德里安 (Lamourette, Ad-

rien 1742—1794) —— 法国主教，1792 年是立法议会议员，1794 年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第 125 页。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 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 第 13 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 著名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议员；1855 年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 第 31、44、55、62、70 页。

拉托，让·比埃尔 (Rateau, Jean-Pierre 1800—1887) —— 法国律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波拿巴主义者。—— 第 67、68、71、72 页。

拉伊特，让·厄内斯特 (La Hitte, Jean-Ernest 1789—1878) —— 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 (1850—1851)，曾任外交部长 (1849—1851)。—— 第 113 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 ——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一直住到 1870 年初，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与德国签订和约而辞职。—— 第 30、40、43、44、51、53、62、70、73—75、80—85、88、100、114、121 页。

- 老弗里茨——见弗里德里希二世。
-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 Alexandre)——巴黎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工人的六月起义。——第121页。
- 勒姆安，约翰(Lemoinne, John 1815—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英国记者，后为主编。——第123页。
- 列米尼耶，让·路易·欧仁(Lerminier, Jean-Louis-Eugène 1803—1857)——法国法学家和奥尔良派政论家，三十年代末为保守主义者，“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1831—1839)，由于学生抗议而离职。——第71页。
-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28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28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25—28、30、56、59、61、63、91、94、97—101、124、126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法国王位僭望者。——第126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Louis IX, 或 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1226—1270)。——第93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102页。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116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57页。
- 律斯勒，康斯坦丁(Rößl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论家和官员；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1892)的身份替俾斯麦政策作辩护。——第22页。

M

- 马蒂约·德·拉·德罗姆，菲力浦·安都昂(Mathieu de la Drôme, Philippe-Antoine 1808—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倾向山岳党；1851年政变后流亡比利时。——第71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64页。
- 马尔歇(Marche)——法国工人，1848年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第32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第44、52、56、57、59、73、81、82页。
- 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41、42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 (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 ——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5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3—1879)。——第11页。

蒙克，乔治 (Monk, George 1608—1670) ——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71页。

蒙塔郎贝尔，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首领；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101、102、121页。

摩莱，路易·马蒂约 (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 ——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 (1836—1837、1837—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年为秩序党领袖之一。——第91、92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真姓波克兰

Poquelin) ——伟大的法国剧作家。
——第124页。

N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27、63、64、102、103、106、107、128、130页。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5、10—13、55、60—69、71、72、74、76、80、83—85、93—96、101—103、107、108、112—114、124—130页。

奈，埃德加尔 (Ney, Edgar 1812—1882) ——法国军官，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立法议会议员 (1850—1851)。——第94页。

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 ——俄国皇帝 (1894—1917)。——第19页。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 (Neumayer, Maximilian-Georg-Joseph 1789—1866) ——法国将军，秩序党的拥护者，巴黎部队的司令 (1848—1850)。——第130页。

P

帕尔曼蒂耶 (Parmentier) ——法国园主和金融家，1847年因贿赂官吏受审。
——第100页。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 (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1880) ——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多次参加政

府，第二共和国时期任财政部长。——第 94、100 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 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第 11、119 页。

R

日拉丹，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 ——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地）曾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 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 122 页。

S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 (Sébastiani, Horace 1772—1851) —— 伯爵，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 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的外交使节；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 第 48 页。
赛居尔·达居索，雷蒙·保尔 (Segur d'Aguesseau, Raymond-Paul 1803—1889)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所有的执政党都参加过，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代表。—— 第 114 页。

尚博尔，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Charles 1820—1883) —— 伯爵，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 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王位僭望者，称亨利五世。—— 第 93、126 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

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 —— 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年 6 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与驱散巴黎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流放，1859 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在麦茨被俘；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 64、65、71、72、82、88、92、125、129、130 页。

圣路易——见路易九世。

苏，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 ——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 第 108、120、121、123 页。

苏路克，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1782 左右—1867) —— 黑人，海地共和国总统，1849 年自封为皇帝，称法斯廷一世；反波拿巴主义的报刊称拿破仑第三为苏路克。—— 第 64、107、111 页。

T

特雷拉，乌利斯 (Trélat, Ulysse 1795—1879) —— 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部长（1848 年 5—6 月）。—— 第 46 页。

梯也尔，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第 11、91、94、96、108、121、124 页。

W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

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11页。

维达尔, 弗朗斯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 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112、114、120页。

维维延, 亚历山大·弗朗斯瓦(Vivien, Alexandre-François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40年任司法大臣, 1848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第59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93页。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 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第102

页。

乌迪诺, 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1791—1863)——法国将军, 奥尔良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9年曾指挥侵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 曾企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第76、83页。

Y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统帅, 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第129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60—140)——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21页。

雨果, 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94、95、124页。

书 号 1001 · 2
每 册 0.30 元